

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进程研究

卢一幸 王学军

内容提要: 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影响,“一·二五”革命推翻了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权。之后,埃及经历了短暂的过渡期、穆尔西民选政权时期,并迅速进入了塞西政府时代。穆尔西民选政权的迅速失败与军方代表塞西连任总统,反映了埃及民主转型之困局。军队在埃及政治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军方、伊斯兰主义政党与自由世俗派政党之间的力量博弈与关系互动构成了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进程戏剧化变化的核心动力,可以解释埃及民主转型的短暂成功、迅速失败以及强人政治的复归。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进程说明,埃及民主进程还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 埃及; 军队; 穆兄会; 世俗政党; 权力博弈; 民主化

作者简介: 卢一幸,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洲国际关系(浙江金华,321004);王学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非洲安全与大国对非政策(浙江金华,321004)。

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影响,“一·二五”革命推翻了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政权。^①埃及随后经历了短暂的穆尔西(Mohamed Morsi)执政时期后,便进入了塞西(Abdul-Fatah al-Sessi)政府时代。穆尔西民选政权的迅速失败与军方代表塞西连任总

^① 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发起了反穆巴拉克的游行示威活动,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下台,这场运动被称为“一·二五”革命。

统，反映了埃及民主转型之困局。本文认为，军队在埃及政治权力结构中至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后穆巴拉克时代，近年埃及民主转型与政治发展的戏剧化进程的核心动力在于军方、伊斯兰主义政党与世俗自由派政党之间的关系结构与具体互动。它可以解释埃及民主转型的短暂成功、迅速失败以及强人政治的复归等一系列戏剧性变化。本文将分阶段回顾并分析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发展的进程及其背后的原因，并据此思考和展望埃及民主政治发展的未来前景。

一 “一·二五”革命中的政治互动

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下，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1月28日，埃及全国变革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Change）和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 Emblem，以下简称“穆兄会”）等组织宣布支持革命，由此，这场革命发展成为集结宗教组织、自由世俗派、军队等多股力量共同参与的寻求民主的运动，并最终迫使穆巴拉克辞职。虽然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埃及民众发起的，但由于民众的力量过于分散，且缺乏统一领导，运动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那些有组织的政治势力手中。事实上，这场运动在开始初期，也并不为埃及的各方势力所看好。从加入斗争行列的时间来看，埃及各方也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各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在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立场。事态的最终走向也是各方势力不断互动的结果。

（一）穆兄会与世俗政党的联合

在穆兄会发展历史上，随着青年学生的加入，穆兄会也出现过自由化的倾向，这批青年是穆兄会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但穆兄会领导层始终被老一代的保守派占据，自由派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从整体上看，穆兄会依然呈现保守化的趋向。随着自由派和保守派矛盾的不断加深，出现了1996年70多名自由派青年离开穆兄会成立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的事件，穆兄会内部的自由派力量进一步遭到削弱。^① 2010年成

^① Carrie Rosefsky Wickham, *Mobilizing Islam: Religion,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18.

为穆兄会总导师的穆罕默德·巴迪亚 (Mohamed Badie) 依然是保守派势力的代表, 因此“一·二五”革命时期, 穆兄会依然被保守派掌控。可能也是由于保守派势力的强大, 穆兄会并未从一开始支持革命。在革命准备阶段, 穆兄会领导人就曾表示1月25日不是发起政治斗争的好时间。^① 由于穆兄会的特殊性, 埃及历届政府都担心穆兄会涉足政治会动摇其统治, 因而一直限制穆兄会的行动。穆兄会也需为其自身发展预留足够空间, 在与埃及政府的关系上一直采取的是半合作半斗争的立场, 而这场革命能否成功在当时还是未知数, 如若失败, 支持革命的穆兄会必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因此不便于在革命之初便与政府“唱反调”支持革命。穆兄会的这种立场也有其他的几点考虑: 其一, 对于穆兄会领导人而言, 优化埃及政治的最优方案是弘扬伊斯兰教义并从底层实现埃及社会的伊斯兰化, 而非通过游行示威;^② 其二, 由于民众常年对于政治的低参与度, 穆兄会并不相信埃及民众自发的运动能达到足够大的规模; 其三, 过早地介入革命, 容易使其他力量误以为是穆兄会主导的革命, 影响后续其他力量的加入。从官方层面看穆兄会并未从一开始就加入革命, 但实际上, 有不少穆兄会自由派青年早就以个人身份参与到革命当中。也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存在, 后期穆兄会与埃及民众、世俗党派的合作才有了良好基础。

部分世俗政党在革命之初就明确表达了支持革命的立场, 包括新华夫脱党 (New Wafd)、民主阵线 (Democratic Front)、明日党 (Ghad party) 等。但在当时, 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世俗政党拒绝参加革命, 并呼吁其成员不要参与游行示威活动, 这些政党大多是埃及政府批准的, 登记在册的合法政党。^③ 这些政党普遍规模较小, 对于它们而言, 生存是首要任务, 只有在埃及政府的“保护”下, 它们才有可能继续存在并获得政治资源, 因此它们不会在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 作出反政府的举动。

当1月25日大规模游行示威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后, 穆兄会看到利用这次革命有可能结束长期被排除在埃及政治之外的命运, 于是很

① M. Slackman “In Mideast Activism, New Tilt Away from Ideology”, <https://www.nytimes.com/2011/01/23/world/middleeast/23egypt.html>, January 23, 2011.

② 参见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 商务印书馆, 1997, 第400页。

③ Masoud Tarek “EGYPT-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Contemporary Egypt: Democracy Redefined or Confined?”,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7, No. 3, 2013, pp. 142 - 143.

快宣布支持革命，并组织其成员参与到革命中。^① 随着事态的发展，那些原本持消极态度的世俗政党，一方面担心这场运动被穆兄会势力控制，另一方面也担心在此时不支持民众日后有可能丧失在埃及政坛中的地位，于是在民众力量的裹挟下也开始加入这场反穆巴拉克的革命当中。世俗政党能在此时与穆兄会达成合作主要还是因为在当时埃及的政治环境下，它们同属被打压的反对派，如果此时依然躲在埃及政府的“保护伞”下，极有可能随着以穆巴拉克为代表的旧势力的倒台而消亡。穆兄会和世俗政党除了声援革命外，还与各方力量开展合作，发表革命目标和纲领，结成同盟一致对外。

穆兄会以及世俗党派较早地支持并参与革命，使其在当时有能力对埃及的政治走向施加影响，也使其在埃及的政治地位极大提高。这场民主运动的规模随着各路力量的汇入不断壮大，却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经营多年的穆巴拉克政权，革命派还需寻求更强大的支持。

（二）军队立场的转变

埃及军队作为穆巴拉克政权的一部分，在革命初期确实发挥着维护埃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军队在介入之初，就表明了恢复埃及社会秩序的立场，随后更是表明了不会将枪口对准民众的中立立场。穆巴拉克依仗着军队的力量拒绝辞职，革命派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呼声越来越大，面对着国内和国外的压力，穆巴拉克下台的趋势已很难改变。军队必须要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抉择，综合考量后，军队选择了联合革命派，迫使穆巴拉克辞职。

回顾“一·二五”革命的爆发与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的过程可发现，军队虽然是穆巴拉克政权的一部分，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军队站在哪一方，哪一方方便占据了主动权。试想，若是最后军队没有转变立场，可能“一·二五”革命也很难取得成功。埃及军队作为穆巴拉克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守护者，原本应该坚定地站在穆巴拉克政府的一边，化解政府面临的威胁，最终却成为压倒穆巴拉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埃及军队作为暴力统治的工具，在革命中原本也应该是民主势力打击的对象之一，但在“一·二五”革命中埃及民主势力却对军队网开一面，

^① Masoud Tarek, "EGYPT-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Contemporary Egypt: Democracy Redefined or Confined?",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7, No. 3, 2013, pp. 143-144.

甚至对军队抱有极大期望。这一反常情况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第一,在关键时刻相信军队、依赖军队成为埃及人的一种传统。早在1952年,就是靠着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 Movement)”发动军事政变,带领人民推翻法鲁克王朝才使埃及获得了真正的独立。^①军队在独立后的国家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军队的卓越贡献已经深入人心。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也称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在埃及军队的奋勇作战下,埃及顺利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萨达特时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也称“十月战争”),埃及军队也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两次战争中军队的突出表现,不仅维护了埃及的国家主权,更使军队在埃及民众内心的地位不断巩固与提高。正是军队在埃及历史上的种种贡献,使得埃及民众在关键时刻将军队当成了可信赖的对象。军队以中立的姿态介入革命,使广大民众相信军队不会弃民众的意见于不顾。另外,民主势力在“一·二五”革命中虽然集结了多方力量但依然缺乏实际战斗力,因而要取得对穆巴拉克政府的胜利,必须团结军队力量。

第二,埃及军方需维护自身利益。在穆巴拉克执政初期,为了使受军队职业化改革影响退役的军人有新的出路,穆巴拉克允许军队涉足埃及经济领域,同时给予诸多特权,使军队一路发展成为埃及国内最有实力的经济实体,拥有诸多经济利益。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穆巴拉克企图让他的小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继承其总统的职位。贾迈勒早年生活在美国,长期从事金融行业,进入埃及政坛后,推动埃及经济私有化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军队而言,如果贾迈勒继任总统,将会严重威胁到军队的经济利益。另外,穆巴拉克也有削弱军队的企图。在执政后期,穆巴拉克不断加强埃及警察的力量,从2002年到2008年,埃及警方的预算从35亿埃及镑(5.83亿美元)涨到了200亿埃及镑(33亿美元),飙升了近6倍,而这期间,军队的预算仅增加了1倍。^②这一时期,与穆巴拉克接触最为频繁的也是警方人士而非军方人士,在穆巴拉克政权中担任高级官员的军官数量也在减少,这一情况导

① 参见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第30页。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Lost in Transitio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Egypt’s SCAF”, *Middle East Report* 121, April 24, 2012.

致了军队逐渐被边缘化。“一·二五”革命爆发初期，民主势力与穆巴拉克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尚未明显，此时军队显然以中立立场介入更为合适。随着各方势力的不断加入，民主派与穆巴拉克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趋于明显，穆巴拉克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若此时军队依然站在穆巴拉克一方，其势力必然随着穆巴拉克的下台而削弱，日后想要维护其自身利益便更为困难。于是，军队选择了民主势力的一边。

“一·二五”革命中的政治斗争，主要是以穆巴拉克为代表的旧政权与包括宗教组织、世俗政党以及广大埃及民众在内的民主势力的斗争。在革命中，埃及世俗自由派摒弃前嫌，与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开展合作；穆兄会也开始减少对其坚持的伊斯兰教义的强调以符合民众的民主理念，以更积极的姿态团结民众力量；尽管军队是穆巴拉克政权的守护者，但其具备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斗争中能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立场。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世俗政党、军队最终走向联合，一致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使埃及迈出政治变革、民主转型的第一步。军队在“一·二五”革命的成功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原本掌握在民主势力手中对于埃及政治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军队麾下，奠定了后阶段军队在埃及政治中的地位。

二 过渡期的政治博弈（2011年2月11日至 2012年6月29日）

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埃及进入过渡期，开启民主转型。过渡期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以下简称“最高委员会”）把持政权，过渡期至2012年6月30日穆尔西就任埃及总统结束。^①原本一致对外的政治联盟也在此刻开始分化，各方都希望能掌控埃及，但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实力相对较弱的几方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组合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后，埃及政坛步入了军方势力、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与世俗自由派三方互动斗

^① 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由数名代表着埃及武装部队各个分支的领导人以及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组成。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平时并无常规议事日程安排，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集中磋商。

争的新阶段。

(一) 军队与革命派的斗争

穆巴拉克辞职后并没有将埃及政权委托给内阁或者议会,而是交给了由埃及高级军官组成的最高委员会。虽然目前无法了解穆巴拉克作出此决定的原因,但这一决定极大提高了军队的地位,使军队能够左右埃及的政治走向,但这也成为埃及民主转型成功的一道障碍。

最高委员会接管政权后,引发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反对者的游行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军队动用武力驱散抗议者。除此之外,军队还动用其掌握的临时立法权扩大自身权力。2011年3月,最高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宪法声明,单方面修改了1971年宪法中的55条规定,其重点内容是增强军方权力。^①该声明在法律上禁止对军队预算进行民事监督,授权军队从其部队中选出一名国防部长而非总统任命,宣布战争决定将完全由最高委员会作出,并申明不考虑总统的意见^②。军方掌控下的埃及政治与革命中埃及人民追求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军方的种种做法导致了民众强烈的不满,民众也始质疑军方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意愿。双方矛盾不断地累加,游行示威活动层出不穷,规模也越来越大。军方不得不对自身的施政方案作出调整。

在“一·二五”革命中民意的力量已经得到了集中体现,因而在过渡初期,如若完全置民众呼声于不顾,刚刚把持埃及政权的最高委员会可能也将落得同穆巴拉克一样的下场。另外,军方也逐渐意识到,不断扩大自身权力并谋求长期掌握政权的做法将丧失已获得的政治地位,并有可能落入无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境地,长期以来在民众心中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也将化为乌有。军队谋求长期掌权的企图并未改变,但必须有所取舍,可在此时放弃权力也很难确保军队未来的利益,于是军方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先举行议会选举,并试图在选举过程中寻求新的安排。

(二) 伊斯兰势力与世俗政党的争夺

革命派除了需要与军队斗争外,其内部也并不太平,革命胜利初期

^① 见 Khaled Elgindy, “Egypt’s Troubled Transition: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2, March 2012, p. 94.

^② “Constitutional Declaration 2011”, <http://www.egypt.gov.eg/english/laws/constitution/default.aspx>, March 20, 2011.

各派势力就因何时进行议会选举等问题产生激烈矛盾。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和规模比较大的老牌政党号召提前进行议会选举，新成立的政党和规模比较小的政党为使自已获得较为充足的准备时间则赞成推迟议会选举。新成立的政党显然不敌老牌政党和伊斯兰势力，在议会选举时间确定后，革命派内部的斗争转向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与世俗政党的竞争。最高委员会在接管埃及政权后发表的名为《第三号公报》的声明中表示将不会取代“合法政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被禁止的政党被合法化，总统的任期被限制，加强了对选举的司法监督，并为政党登记确立了一个更加透明的程序。^① 这些新政策都为革命派参与埃及政治奠定了基础。

此时，许多具有宗教背景的政党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自由与正义党就是在此时由穆兄会组建的政党。原本备受禁锢的世俗政党，已能够自由地开展政治活动并广泛表达其政见。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都开始积极地参加埃及政治活动，2011年11月的议会选举，便是世俗政党与伊斯兰政党开展争夺的第一战。

长期以来，由于世俗政党受到埃及政府的严格控制与压迫，几乎没有民众基础，也缺乏行动力，甚至在“一·二五”革命爆发初期都不认为民众有能力撼动政府，不愿参与到革命中，因而难以获得民众信任与支持。除了原本就有的世俗政党外，2011年2月以后也有数十个新政党登记成立，但这些政党大多规模较小，短时间内完成政党建设都十分困难，更别提要组织群众参与选举。另外，埃及的城市和农村在政治发展上的隔阂依然存在，埃及的农村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0%，而世俗政党的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城市地区。^② 以上原因都导致了世俗政党在议会之争中缺乏战斗力。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有着明显不同，穆兄会虽然长期受到政府控制，但依然通过慈善等途径向基层施加影响。凭借强大的组织网络和原本就有的民众基础，很快就能动员民众参与议会选举。在与世俗政党的争夺中，伊斯兰势力很快占据了上风。2012年1月议会选举结果公布，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光明党分别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二者都是伊斯兰政党，共获得近

① 《埃及军方承诺保障权力交接》，<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7991/13899986.html>，最后下载日期：2011年2月12日。

② 参见《埃及城市人口（总百分比）》，<https://cn.knoema.com/atlas/埃及/城市人口总百分比>，最后下载日期：2019年2月28日。

70%的席位。^①

完成对于议会的掌控后，摆在伊斯兰势力前的便是埃及军队了。

(三) 军队与伊斯兰势力的互动

新议会诞生后，议会与军方马上开展了关于立法权的斗争。这场斗争虽有多方参与，但其中穆兄会与军方的分歧最大，这场斗争实际上成为穆兄会与军方的斗争。穆兄会总导师巴迪亚表示，军方预算必须置于议会监督之下，军队移交权力后议会将对其掌权期间发生的流血冲突问责。^② 军方开始担忧将失去对埃及政治走向的掌控，于是开始反扑。2012年6月14日，最高委员会联合最高宪法法院，裁定议会选举违宪，并解散议会。到此，埃及的民主转型又遭遇一大重创，战胜世俗党派的伊斯兰势力也备受打击。

议会解散后，立法权回到了最高委员会的手中。但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穆兄会成员、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成功进入第二阶段，并极有可能当选埃及总统。为限制伊斯兰势力，最高委员会发出新的宪法声明，规定只有在最高委员会批准后总统才能组建和解散政府、批准或拒绝法律、宣布战争，该声明极大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并赋予最高委员会更大的特权。^③ 虽然军方为了维持权力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依然无法改变民众对于民主的向往，也无从改变总统选举的结果，最终，穆兄会出身的穆尔西以51.73%的支持率成功当选，成为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④

从过渡期开始到穆尔西的成功当选总统，整个过程都是各方势力竞争与合作的缩影。穆兄会上台，一方面靠的是长期积累的民众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民众对旧政权、对世俗党派的失望。穆兄会执政固然会产生世俗法律被伊斯兰教法取代的危险，但民众对旧政权死灰复燃的恐惧远

① Virginie Collombier “Politics without Parties: Political Change and Democracy Building in Egyp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EUI Working Paper, Italy: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3, p. 1.

② 《埃及议会选举显露国家未来走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1-22/3621661.shtml>，最后下载日期：2012年1月22日。

③ 参见贺鉴《从立法权更迭看奇迹的政治危机》，《政法论丛》2015年第6期，第95—96页。

④ 参见《多国祝贺穆尔西当选埃及新任总统 美吁尽快组阁》，<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6-25/3982687.shtml>，最后下载日期：2012年6月25日。

超伊斯兰化的恐惧，把长时间遭受打压的穆兄会看作不同于旧政权的变革力量，连续地选择穆兄会及其候选人就是希望在政治过渡中能够更好地除旧布新。^① 除此之外，这也是军方势力向伊斯兰势力妥协的结果。于军队而言，穆兄会本身具有一定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在穆巴拉克时期和“一·二五”革命期间均有所表现。有消息显示，在革命爆发不久后，穆兄会内部就出现与穆巴拉克政府私下媾和以换取政治利益的企图，且在穆巴拉克政府向革命派发出对话呼吁时，穆兄会也是最早予以回应的政治力量之一。^② 军队作为世俗势力的重要力量，肯定不希望埃及政权落入宗教势力之手，但只要让出部分利益就有希望与穆兄会达成一致，这是军队希望看到的。另外，当时的军队面临各方压力：第一，军方对于在未来有效解决埃及的各种棘手问题并没有信心；第二，民众对于军方所主导的政治过渡越来越不满；第三，国际社会也开始向埃及军队交权施加压力。面对以上情况，同时又需维护自身利益，军队只能在此问题上有所让步，以为后续安排留下更多空间。

过渡期的权力争夺，由于世俗政党因力量过弱早早出局，成为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与军方势力之间的较量。在这期间，双方都不具备战胜另一方的绝对优势，只得在斗争中寻求合作。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下，穆尔西才顺利当选埃及总统。

三 穆尔西时期（2012年6月30日至 2013年7月3日）的权力斗争

2012年6月30日至2013年7月3日，穆尔西担任总统，埃及进入穆尔西时期。由于穆尔西的上台与军队的暂时妥协密不可分，其执政过程必然充满挑战和波折。自穆尔西上任之初起，他就面临军方的压力以及其他势力的阻挠，反对之声也从未平息。民选的穆尔西政府仅执政一年，便因为2013年6月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和军队的介入走向失败。面对穆尔西的下台，各国学者、媒体都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有学者

① 王猛 《后威权时代的埃及民主政治构建：回顾、反思与展望》，《西亚非洲》2013年第3期，第52页。

② M. Badí,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e Will Not Negotiate the Existing Regime”, *Al-Masry Al-Youm*, February 3, 2011, p. 4.

认为穆尔西过分追求权力,想要独揽大权,给民众一种重回威权时代的感觉;有学者认为是穆尔西在任期内并没有使民生和经济发生改善导致的;也有学者认为穆兄会的穆斯林意识形态使民众担心埃及成为一个宗教国家。诚然,以上都是穆尔西执政失误之处,但穆尔西接手的埃及本就是一个“烂摊子”,短时间内想取得改善非常困难,归根到底,穆尔西还是败给了权力博弈。穆尔西时期的埃及政坛,依然是伊斯兰势力、军队、世俗自由派之间的力量博弈。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在逐渐世俗化的埃及必然面临着来自世俗力量的挑战。军队同样作为世俗力量的重要代表,使得这一时期的三方博弈带有明显的教俗之争的色彩。

(一) 世俗自由派与伊斯兰势力的斗争

从穆尔西上任之初起,作为反对派的世俗政党就与穆尔西政府在权力归属、“伊斯兰化”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2012年11月22日,穆尔西宣布了一项宪法声明,在该声明中,穆尔西将立法权和行政权置于总统的控制,并任命了一位新总检察长,违反了他不干预司法事务的承诺。第二天,多位世俗政客以及大多数世俗政党的领导人在位于开罗的新华夫脱党总部举行会议,强调他们反对穆尔西的声明,并在这次会议期间成立了救国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作为一个世俗的反对派联盟,并发动民众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发起大型集会,要求废除该声明。最终穆尔西不得不放弃该声明。该事件不久后双方又因新宪法(即《2012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2012宪法”)的“伊斯兰化”产生了激烈矛盾,世俗政党多次号召民众反对2012宪法,但这份宪法还是在穆尔西的推动下以63.8%的支持率获得通过。^①这一次的失败使得世俗政党对通过民主的方式反对现任总统感到失望,于是越来越倾向于谋求与军队联合推翻现政府。

穆尔西时期穆兄会一直未能与世俗自由派达成合作也与穆兄会内部的分化有着深刻联系,这种分化在“一·二五”革命之前就已出现,“一·二五”革命中这一分化进一步加深。1996年自由派的脱离,导致穆兄会保守、僵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一·二五”革命中这种保守和僵化,

^① 参见丁峰、夏新华《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宪法变迁》,《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第132—133页。

使穆兄会在“一·二五”革命初期就寻求向旧政权妥协，这一举动又导致了一批开明人士离开穆兄会，例如穆兄会资深成员哈萨姆·阿布哈利勒（Haitham Abou Khalil）就因此事离开穆兄会，这批开明人士中的大部分正是当时与世俗自由派合作的重要桥梁。政教不分，又是穆兄会的另一致命弱点。革命后成立的自由与正义党已完全被保守势力操控，穆兄会始终坚持政教合一原则，谋求建立一个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拒绝接受建立在政教分离基础上的“土耳其模式”，多次表示不会效仿“伊朗模式”，即在强调“真主主权”的同时也肯定人民间接主权的“双重负责”机制。^①这是一种为适应现代政治需要而提出的理念，伊斯兰民主并不等同于西方民主，穆兄会所秉持的“真主主权”依然高于“人民主权”，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未曾改变。埃及的穆斯林大多属于逊尼派中的哈乃斐和沙斐仪派（Hanafi-Al-Shafi'i），这一教派对于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更偏现代化，因此大多数埃及人对于西方民主理念的认同度比较高。^②自由与正义党执政后出现的保守化倾向以及其坚持的“真主主权”，使得埃及民众与世俗党派对其的不满程度也逐渐加深。

大多数世俗政党都谋求与军队合作推翻穆尔西政府的原因也与世俗党派本身的缺陷有关。除了缺乏民众基础和组织力外，世俗党派数量过多，党派间的合作结盟过于随意且不稳定等也是其无力与政治伊斯兰势力抗争的原因。这一弱点在议会选举与总统选举中均有暴露，例如，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总统选举中加入了名为“埃及集团（the Egyptian Bloc）”的联盟后就弃其成员的意见于不顾转而支持其他候选人，导致之前的努力被荒废，更是导致内部分化。^③而且，世俗党派中也有不少的保守势力。^④这部分保守派在穆巴拉克时期就是通过与政府合作来获得议会席位等政治资源，而在穆尔西时期由于穆兄会与军队的矛

① 廖百智《埃及“穆兄会”垮台原因及前景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第32页。

② 根据对伊斯兰教圣训的不同理解，逊尼派穆斯林中产生了四大学派，分别为哈乃斐派、沙斐仪派、马立克派和罕百里派。埃及受哈乃斐派和沙斐仪派影响较深，因而对于圣训的理解兼有这两派的特征。参见（美）阿菲芙·鲁特菲·赛义德·马索特《埃及史》，邹冬心译，东方出版中心，2018，第5—30页。

③ Virginie Collombier, “Politics without Parties: Political Change and Democracy Building in Egyp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EUI Working Paper, Italy: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3, pp. 12–13.

④ 参见牛新春《血腥清场：埃及折向何方》，《世界知识》2013年第17期，第38页。

盾导致议会迟迟无法运作,没有议会,这部分保守派就很难获得政治利益,这反而使他们更愿意回到威权政府的统治以获得“存在感”。世俗党派过于固执也是原因之一,世俗党派对于穆尔西、穆兄会、自由与正义党发出的对话、协商请求均以拒绝回应,拒绝与穆尔西政府合作,导致穆尔西化解矛盾的意图落空。^①世俗政党在处理与穆兄会等宗教势力的关系时占主导地位,选择合作还是斗争取决于政治环境对待世俗政党的态度。^②当政治环境比较残酷时,世俗政党往往寻求与宗教势力合作以抱团取暖;当政治环境呈现出宽松态势,世俗政党便会选择排斥宗教势力,以获取更多政治资源。在当时的宽松环境下,世俗党派为获取政治资源,不惜加大了对军方干预的号召,赋予军事政变以合法性,最终使民主转型成果消耗殆尽。

(二) 伊斯兰势力与军队的斗争

由于埃及的政治制度,总统是埃及国家权力的象征,享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军权等诸多权力。代表着伊斯兰势力的穆尔西就任埃及总统,国家权力开始向伊斯兰势力转移。以广大世俗政党为代表的反对派势单力薄,无法对执政党开展有效的制衡,军队成为可以制衡穆尔西政府的唯一力量。为限制穆尔西,最高委员会只交出了行政权,武装部队、国家情报总局、内政部、法院和检察院这几个埃及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仍处于军方控制或影响之下。^③作为新生政权,穆尔西政府依然需要军队的支持,因而即使在总统权力大受限制的情况下,仍对军方保持着友好的态度。看似埃及走上了民主政治的轨道,但是权力的不平衡使得权力分立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制衡作用,反而使得各方陷于权力斗争之中。

表面的和平难以掩盖内部的暗涌,为了夺回权力,穆尔西、自由与正义党与军方展开了多次博弈。2012年7月8日,穆尔西颁布总统令要求恢复之前被军方解散的议会,以夺回立法权。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军

① Michele Dunne and Amr Hamzawy, “Egypt’s Secular Political Parties: A Struggle for Identity and Independence”, U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017.

② 参见易小明《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研究——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33—35页。

③ 王健《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6期,第91页。

方和法院的不满，法院随即驳回总统令，穆尔西被迫接受。^①穆尔西进一步插手情报机构和军队事务，2012年8月，埃及边境哨所遭袭击，穆尔西立刻采取行动，更换了情报局负责人，解雇了北西奈省的省长，要求最高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坦塔维（Marshall Mohamed Hussein Tantawi）接任宪兵指挥官，并任命了一名新的共和国卫队指挥官和两名警察局长。^②几天之后，穆尔西又对军队高层做了人事调整，任命塞西为新任国防部长，并取消了之前军方为限制总统权力而颁布的宪法声明。^③新上任的塞西依然是军队出身，并未对军队产生根本影响，且军队的根本利益还需依赖穆尔西的政策，军队也需要表现对总统的支持以显示尊重民意。因而，遭遇大换血的军队对穆尔西的决定表示同意。这一阶段，双方虽然有分歧，但仍以合作为主。随着穆尔西政权的逐渐巩固，其政策必将触及军队的根本利益，双方的合作也必然分奔离析。

穆尔西试图与军队在经济领域寻求共同立场，推出了苏伊士运河扩建项目，最后却没有选择军队作为主要合作伙伴。这一决定使得军队企业在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被边缘化，军方极度不满，时任国防部长塞西表示没有军方的批准苏伊士运河扩建项目不会取得进展。^④经济利益几乎成为埃及军队的最大利益，经过与穆尔西的几轮交锋，军队逐渐意识到只能依靠自身才能维护其经济利益。此事件后，军队与穆尔西政府的合作越来越少，矛盾却是越来越深。

军方最初同意穆尔西担任埃及总统本就是为了寻求新的安排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如今却因穆尔西的政策导致其根本利益受损，这是军方不能接受的。穆尔西施政方面的失误使得世俗政党借助民众的反对声再次发起了对以穆尔西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的进攻。宗教与世俗、宗教与军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军队和世俗力量走到一起，发动政变推

① “Egypt Crisis: Mursi Seeks Talks on Parliament Row”,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8800533>, July 13, 2018.

② “Egypt’s Morsy Walks a Political Minefield in Sinai Crisis”, http://world.time.com/2012/08/09/egypts-morsy-walks-a-political-minefield-in-sinai-crisis/?xid=rss-topstories&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time%2Ftopstories+%28TIME%3A+Top+Stories%29, August 9, 2012.

③ “Crowds in Cairo Praise Morsi’s Army Overhaul”,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2/08/201281215511142445.html>, August 13, 2012.

④ 参见《苏伊士运河新工程前途未卜》，<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12/c157278-25453236.html>，最后下载日期：2014年8月12日。

翻了穆尔西政权，也就推翻了伊斯兰势力在埃及的统治，军队开始走向埃及权力的中心。

军队之所以能在权力博弈中获得最后的胜利，与其表现出的团结存在必然联系。庞大的埃及军队一直在高级军官和最高委员会的掌控之下，而埃及高级军官与最高委员会的团结程度远高于埃及的其他政治力量，因此军队也很少出现内部分化。^①如此庞大的机构内完全不存在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最高委员会的管理之下，军队内部的意见分歧很少被公之于众，这保证了军队的内部矛盾不会被外界势力利用。在权力博弈中，穆兄会与世俗党派的力量都曾因内部矛盾而出现分化或者重新组合的情况，唯有军队在整个过程中都在用“同一声音说话”。正是这一杰出的团结表现，使得军队能够审时度势，灵活地与其他势力达成合作而无内部分化之忧。

四 军队主导期的埃及政治现状与权力关系结构 (2013年7月3日至今)

2013年7月3日穆尔西下台，最高委员会再次掌控埃及政权，进入第二个过渡期，之后由军人出身的塞西担任埃及总统并实现连任。在这一阶段，军方全面把持埃及各项权力，时至今日，埃及仍处于军队主导之下。

(一) 埃及政治现状

“一·二五”革命以来各种力量较量及其结果表明，军方实际上决定着现阶段埃及变局和政治转型的走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埃及政治生活的“总节制阀”。^②世俗政党和民众对于政变的支持给了军队合法理由，使军队在政变后避免遭受西方民主国家的制裁，从而有机会专心处理国内事务。由于前一阶段的行动，军队在权力斗争掌握了主动权，穆兄会与世俗政党已纷纷衰败。原本相互制衡的三股力量，如今只剩下

^① Hillel Frisch, “The Egyptian Army and Egypt’s ‘Spring’”,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6, No. 2, 2013, p. 181.

^② 朱泉钢、王林聪《论军队在埃及变局及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西亚非洲》2014年第3期，第93页。

军队，于是军队通过宪法公投、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全面掌控了埃及的各项权力。

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只有通过选举的政治程序才能产生政府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则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并且这一政府事实上拥有制定新的政策的权力，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来源于新的民主程序，不必与其他法律主体分享权力。^① 民选的穆尔西政权已被军事政变推翻，塞西虽然也是通过选举上台并实现连任，但这两次选举并不具备自由性和普遍性，军方的高压政策迫使有能力的候选人纷纷退出竞选或无法参加竞选，只有塞西具备当选总统的实力。塞西时期各项权力也不是通过自由和普遍的选举获得的，例如在军方对反对派的严厉打压下，反对派几乎无法参加议会选举，因而塞西时期议员成员基本都为军方的支持者，议会立法权的获得也是在军队的操控之下。军队独霸而其他势力凋零的状况也直接导致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无法有效分立并制衡。以民主转型的标准对照当前埃及的政治状况，埃及显然已经陷入民主转型困境。

当前的这一民主转型困境虽然与过渡期、穆尔西时期各方的权力博弈密不可分，但也与埃及政治长期以来的低制度化具有关联性。如今，军队主导的埃及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回升，街头政治逐渐减少，塞西就任总统后也实现了连任，但政治的低制度化特征也并未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消亡。^②

第一，法律的权威性依然缺失。2012 宪法在穆尔西被罢黜的当天便被最高委员会宣布停用，并再次组织修订，修订后的宪法于 2014 年初被付诸公投并通过。同样的情况在穆尔西时期与过渡期均有发生，穆巴拉下台后，最高委员会很快颁布了《2011 年临时宪法》以替代穆巴拉克时期的宪法；穆尔西上台后也很快签署了 2012 宪法。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本应成为国家组织和运作根本条例，但在埃及却在不断上演着停宪、修宪的循环。此外，埃及各方势力依然热衷于争夺立法权以扩大自身权力，导致埃及立法过程呈现出被个别人操控的现象。还有，无论是最高委员会还是穆尔西，抑或是现在的塞西都曾通过颁布宪法声明

① [美] 胡安·J. 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第 3 页。

② 高奇琦 《埃及动荡于低政治制度化》，《法制日报》2013 年 7 月 9 日，第 10 版。

来修改宪法的内容,这也使得埃及法律呈现出“随意性”。以上情况,均是埃及法律缺乏权威性的表现,法律权威性的缺失不利于政治的根本稳定。

第二,表达渠道依然缺乏,政治参与依旧混乱。穆尔西下台后,军方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并动用武力镇压各类反对者。军方的这些动作不仅打击了穆兄会,更是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其他的伊斯兰势力以及反对军方势力的世俗政党也不敢再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各大媒体也不敢再有异议,甚至学者、学生都不敢再发表相关言论。作为权力博弈中的失败者,穆兄会和世俗政党只能转入地下活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世俗政党和伊斯兰势力就因为长期被压制而无法获得表达渠道,当前军队掌控下的政党制度较穆巴拉克时期而言不仅没有放宽,反而更加严酷,导致政党无法合理参与政治。政党的作用无法发挥,进一步导致了民众诉求无法传达,长期的压制极有可能引发逆反心理,最终有可能导致民众再次选择以暴力方式参与政治。

第三,权力依然缺乏制衡。埃及2014宪法规定了禁止以“宗教、种族、性别或地缘性”为基础所成立的政党。^①这显然是为穆兄会量身定制的,以防止其再度回归埃及政坛,而且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松绑迹象。而曾经作为民主卫士的世俗党派面对军队对国家的控制依然束手无策,多数只能采取支持军方的立场。过去的统治者采取的也是打压反对势力的态度,致使反对派无法发挥制衡的作用。缺乏必要的制衡,军队一家独大的埃及又回归了过去的威权政体,埃及政治难以转向民主有序的路径。

埃及政治现状的特征并不局限于以上几点,想要突破也必须在符合埃及的国情下进一步推进改革。

(二) 军队主导的权力关系结构与民主困局的反思

在过去,军队从未在埃及占据过如此核心的位置,在穆巴拉克时期乃至更早的萨达特时期,控制埃及政治的都是当时的埃及政府。尽管这些政府的成员多数有着军队背景,但并不直接代表军队利益。军队除了维护自身利益外,更多承担的是守护政府、维护秩序的职责。当然,军队在埃及的特殊地位,使得军队有能力动用已掌握的资源对埃及的政治

^① 王琼 《政治变革中新旧埃及宪法的比较分析》,《亚非纵横》2014年第2期,第20页。

施加影响。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有着悠久的历史，也一直试图对埃及政治施加影响，但历届埃及政府都担心穆兄会力量过于庞大会影响自身在埃及的统治，于是对其施以严格的控制。世俗政党从诞生之初起，就是埃及政府为维持政治多元化的工具，随着这些政党的发展，虽然它们都希望能在埃及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埃及政府并没有给予它们足够的政治空间。在“一·二五”革命前，除了军队能对埃及政治产生较大影响外，其他势力基本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一·二五”革命爆发后，为实现民主转型，宗教势力和世俗自由派密切合作联系群众，最后拉拢军队，成功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凭借宽松的民主氛围，伊斯兰势力、世俗政党实现从边缘化到权力斗争中心的升级，与军队共同成为埃及政坛“三巨头”，左右着埃及政治的未来走向。从之后三方博弈的过程来看，世俗政党一直将伊斯兰势力视为最大竞争对手，可无奈世俗政党力量过于单薄，无力与之竞争，只能寄希望于军队。而伊斯兰势力需要同时应对来自军队和世俗力量的压力，虽然其凭借长期积累的群众基础走向权力中心，但是要维护其地位，需要向各方妥协或与各方合作。军队的目的是要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当发现与其让其他力量维护自身利益不如自己掌握权力更有保障时，于是迅速出手夺取权力。

纵观当前实行民主政治的其他国家，其呈现出的显著特点便是国内并不存在具备压倒性实力的一方，各方势力都是相互对立又相互需要。^①埃及国内的力量分配并不符合这一特征，这也是埃及实现民主转型所要应对的挑战。从各方力量对比的视角来看，主要有以下挑战：第一，埃及政党的力量过于薄弱。政党所具备的民主性质及其功能，决定了其在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中处于重要地位。而埃及政党，尤其是世俗政党，长期受到政府压迫和控制，极度缺乏组织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关键时刻无法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同时，世俗政党还缺乏斗争理论的指导，世俗政党在“一·二五”革命中的表现就可看出，即使处于领导地位，依然无法领导各方参与斗争。第二，长期将宗教势力排除在政治之外。作为埃及国内的重要力量，长期限制伊斯兰势力参与政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穆尔西施政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是长期远离政治而

^① 王猛 《后威权时代的埃及民主政治构建：回顾、反思与展望》，《西亚非洲》2013年第3期，第61页。

缺乏执政经验的结果。长期处于边缘位置也更容易使得宗教势力朝极端主义方向发展。当然,宗教势力自身也需要有所改变,不可一味追求宗教化,而应该在教俗之间寻求平衡。^①第三,军队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视为首要任务。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价值首先是防止国家体制外的任何力量对现存秩序的威胁和破坏,因而军队的存在本身并不阻碍民主转型。但是倘若民主转型或者日后可能出现的民主政府损害到了军队的利益,军队必然会站到民主的对立面。

对于埃及未来如何实现民主化,何时实现民主化,现在都难以预测。但要实现民主化,需要进一步壮大以世俗政党为代表的埃及政党的实力,需要将宗教势力纳入政治体系并使其在教俗中找到平衡,需要实现军队的职业化并剥离其经济利益。除了以上几点,实现埃及的民主转型还离不开包括埃及人民在内的埃及各方势力对于民主的坚定追求,以及各方势力的精诚合作与相互妥协。

(责任编辑:胡洋)

^① 陈明明 《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4页。

rica in post-apartheid is still difficult to get out of the structural influences caused by the apartheid system. Most South Africans still hope to build a unified country where different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coexist. The road of transformation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is so long and the issues of race and ethnic groups are still the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problems in the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Key Words: South Africa; Apartheid; Race; Ethnic Group; Boundary

A Study of Egyptian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Post-Mubarak Era

Lu Yixing, Wang Xuejun / 46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Tunisian Jasmine Revolution, the January 25th revolution overthrew the Mubarak regime, which had been in power for 30 years. After that, Egypt experienced a short transition period, the period of the Morsi, and quickly entered the era of the Sisi government. The rapid failure of the Morsi regime and the re-election of President Sisi on behalf of the military reflect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in Egypt.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Egyptian politics, the power gam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Islamist parties and free secular parties constitut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Egyptian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post-Mubarak era, which can explain the short-term success and rapid failure of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gypt and the reintegration of strongman politics.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post-Mubarak era shows that the Egyptian democratic process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Key Words: Egypt; Military; Muslim Brotherhood; Secular Party; Power Game; Democratization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igeria

Lin Yun / 67

Abstract: Nigeri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Africa. There is grow-